

新加坡國家收藏（National Collection）的建立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江祐宗

摘要

相較於世界各國的博物館、文化機構發展史而言，新加坡相對是處於落後的位置，然而自 1989 年的《藝術與文化諮詢委員會報告書》（*the Report of 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出版後，以及 1999 年「文藝復興城市計畫」（Renaissance City Plan）的推動下，新加坡陸續成立了許多國際級的博物館，諸如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新加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新加坡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等，皆擁有一批豐富且精緻的藏品，而這些藏品皆隸屬於國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管轄下的「國家收藏」（National Collection）之中。

新加坡國家收藏，作為新加坡近年來得以大力發展藝術文化機構的重要能量，同時也是形塑新加坡博物館定位的要件，其建立的歷史，最早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初英國殖民時期，由殖民首長與地方仕紳所成立的「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the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以及由中國藝術史學者與收藏家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 1916-2013）博士所主導的「馬來亞大學藝術博物館」（University of Malaya Art Museum）。這些原本散於各處的館藏，在新加坡獨立建國之後，絕大多數皆收歸國有，成為國家收藏。本文將回顧新加坡自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建立各類收藏，至二十世紀末期國家大力推廣藝文發展之間，新加坡如何建立起該國的國家收藏，試圖梳理國家收藏的建立背景、來源與種類，藉以了解新加坡在近年文化發展政策上推動的原動力。

關鍵字

國家收藏、新加坡、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the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國家博物館

前言

新加坡自 1965 年獨立建國以來至 1989 年藝術與文化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成立之前，政府並不重視國家文化建設與藝術發展。在此之前，新加坡僅有少數的幾間博物館，如：萊佛士博物館 (the Raffles Museum, 1960 年改稱為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以及馬來亞大學藝術博物館 (University of Malaya Art Museum, 1955-1973)，¹ 前者以自然史收藏為主，兼收人類學、地誌學等相關文物；後者，則是明確地以視覺藝術作為主要收藏對象，由時任館長、中國藝術史學者蘇利文 (Michael Sullivan, 1916-2013) 所主導建立，並在 1965 年獨立建國後，將絕大多數的館藏保留與展示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而萊佛士博物館的藏品，在獨立後被重新分配到各個新成立的博物館中，構成了現今新加坡許多博物館、美術館的成立基礎。

針對新加坡國家收藏的建立史，目前多是以各館各自梳理自身館藏為主，如：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在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一書中，便回顧了自館的收藏建立始末與發展歷程。然而，這樣的研究都僅止於各自館內的收藏史，而未將「國家收藏」視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因此本文將梳理新加坡國家收藏的來源與內涵，以較為宏觀的角度，試圖釐清新加坡國家藝廊成立前的國家收藏狀況與當時的社會背景。

一、收藏奇珍異寶：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現今的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Singapore) 與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Board) 的歷史，最早可以上溯至 1823 年在新加坡書院 (Singapore Institution)² 中，所成立的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目前對於該組織最早且最完整的研究紀錄是來自於《新加坡百年史》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一書中，由曾任館長的哈尼奇博士 (Richard Hanitsch, 1860-1940)³ 所撰寫的〈新加坡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一文。在該文中，他將該組織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

¹ About NUS Museum: <<https://museum.nus.edu.sg/about/about-us>> (2019/01/23 瀏覽)

² 1868 年改名為萊佛士書院 (Raffles Institution)。

³ Richard Hanitsch (1860-1940) 德裔昆蟲學家，1895-1919 年間擔任該館研究員兼館長。

1. 自1823年成立。作為新加坡書院（後改名為萊佛士書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自1844年新加坡圖書館的創建，作為一個私營的公共機構，由多個共同持有人（shareholders）所支持，1849年成立博物館。
3. 1874年圖書館與博物館皆被政府接管，此後被稱為「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⁴

（一）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時期（1823-1844）

早在十七世紀開始，歐洲的貴族與收藏家們，便已經開始有建立「奇珍異寶陳列室」（cabinets of curiosities）的傳統。在奇珍異寶陳列室中會展示如人類學物件、自然標本、古幣甚至也包含如繪畫、雕刻等物件。而這些收藏品在日後也成為了許多歐洲博物館的基礎。⁵ 到了十八世紀，隨著歐洲列強開始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殖民地，這些從殖民地帶回的物件，更是成為奇珍異寶陳列室的重點收藏品。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在歐洲開始出現各式各樣不同的展覽與博覽會，專門來陳列展示這些來自異域的物品。⁶ 到了十九世紀，世界博覽會的出現，更是增長了這類型的展示。而殖民地博物館（colonial museums）不僅是出現在歐洲本土，在殖民地當地也開始出現這類的博物館。這些在殖民地的博物館一方面是服務於歐洲本土的殖民地博物館，作為展示品的供應端；另一方面這些博物館也扮演者展示殖民地政府的功能，當外來的訪客進到這些博物館中，就如同在觀看殖民地政府在該地的成果，向這些外來的觀眾展示屬於「歐洲的」殖民地。⁷ 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由時任明古連殖民地總督（Lieutenant-Governor of Bencoolen）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的提議下所建立的。

⁴ Richard Hanitsch,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vol. I (London: Murray, 1921) p. 519. 《新加坡百年史》出版於1921年，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書籍，記錄了自1819年萊佛士建立了海峽殖民地政府後，到1919年間新加坡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的發展。全書邀請了各領域的專家或相關人撰寫文章，而哈尼奇博士所撰〈新加坡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一文，彙整了現今許多已流失的一手資料，如：年度報告、信件、報紙文章等。

⁵ Arthur MacGregor, *Curiosity and Enlightenment: Collectors and Collection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66.

⁶ 1854 首次舉辦的墨爾本博覽會（Melbourne Exhibition），當中便是以英國各殖民地的物件作為展品。以及在歐陸的許多博覽會，如：1855 與 1867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1862 與 1873 年倫敦國際博覽會（Londo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等，也大量展示了來自各國殖民地的物件。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Singapore: NUS Press, 2015), p. 15.

⁷ Megan S. Osborne, "Early Collector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The Heritage Journal* 3(2008): 3.

在第一個階段中，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是作為學院下的一個機構，儘管大眾仍然可以支付少許的費用來使用該機構的資源，但總體而言，這個時期的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並非是以滿足公共需求為目的所建立的；此外，在1844年之前，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本身尚未具有實質上「博物館」的功能，而僅是在名稱中使用了「博物館」(Museum) 一詞。

這一時期的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在資金匱乏的狀態下，都是依賴文物的直接捐贈或是少數的資金捐贈，來擴充其收藏。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這時的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只存有圖書館的功能，但在收藏的建立上，卻不單只以書籍、文件為限。從新加坡書院早年的幾份年度報告中，可以看到以下的紀錄：

資金將會被用於圖書館暨博物館上，此機構應保存所有被給予的書籍，以及此地區的自然史標本。⁸

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由捐贈的書籍、資金、自然標本以及工藝產品等所建立與維持的機構。⁹

然而，因為此時的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仍然是屬於書院組織中的其中一部分，因此在校方的年度報告中，並未載明每年度確切收入的書籍名稱與各類藏品種類，我們只能從如上引的文字中，得知當時收進藏品的大致類別。

(二) 新加坡圖書館 (Singapore Library) 時期 (1844-1849)

1844年8月13日，時任總督巴德沃爾(William John Butterworth, 1801-1856, 1843-1855 任殖民地總督) 與其他幾位仕紳和殖民地官員，¹⁰ 提議要在新加坡成立一座公共圖書館，並委任納皮爾(William Napier, 1804-1879) 擔任首屆主席。至此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便從原本隸屬於書院的組織，轉變為一個獨立的私營機構，由多個共同持有人來管理與經營，稱作「新加坡圖書館」。這樣的轉變也意味著新加坡圖書館能夠擁有獨立的預算來源，¹¹ 也能更為自主地去規劃機構的發展。共同持有人們也在此時訂定出了明確的收費標準，將會員分為三個

⁸ *Annual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Free School* vol. 3 (1836-37), p. 8. 轉引自 Richard Hanitsch,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p. 521.

⁹ *Annual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Free School* vol. 4 (1837-38), p. 23. 轉引自 Richard Hanitsch,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p. 521.

¹⁰ Thomas Church (1798-1860, 為 Colonial Administrator), William Napier (1848-1850, Lawyer later Lieutenant-Governor of Labuan), James Richardson Logan (1819-1869, founder and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and William Henry Read (1819-1909, Establish Businessman). 資料來源：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653_2005-02-03.html> (2019/02/19 瀏覽)

¹¹ Richard Hanitsch,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pp. 524-525.

階層，¹² 以獲取穩定且充足的營運經費，來維持新加坡圖書館的運作，以及作為新館藏購入的資金。

1845 年 1 月 22 日，改制後的新加坡圖書館正式對外開放，並在開館的 25 天後，召開了第一次的年度共同持有人會議，在該場會議中明確地訂定了新加坡圖書館的宗旨與營運方針。從年度共同持有人會議的紀錄上，可以發現新加坡圖書館，雖然在改制後名稱中已將「博物館」一詞去除，但依舊持續地透過各式各樣的管道，擴充文物類的館藏：

委員會特別藉此機會向利多博士 (Dr. Little) 致謝，感謝他慷慨的捐贈了女王陛下 (Her Gracious Majesty)、阿爾伯特親王 (Prince Albert)、莎士比亞 (Shakespeare)、史考特 (Scott)、拜倫 (Byron) 等人的胸像，這些胸像使得整個圖書館的樣貌，能夠因它們的存在而增色不少。¹³

從上述的這些資料看來，十九世紀前半的新加坡圖書館，仍舊是以圖書文獻作為主要的收藏對象，其餘的文物類館藏並非是主動且積極的去取得的，多半是仰賴外界的捐贈。因此可以推測，當時的這些非書籍類的收藏，勢必是較為凌雜、不具系統性的典藏。而展示的方式，也勢必會礙於空間的限制，而未能擁有一個完整的展示區域，¹⁴ 而是以一種附屬的地位，被作為裝飾品擺設於圖書館之中。

(三) 新加坡博物館成立 (Singapore Museum) (1849-1874)

1849 年，殖民地總督巴德沃爾委託新加坡圖書館保管由印度王公 (Sir Maharajah the Tamoongong of Johore) 所贈與的兩個古老的金幣，¹⁵ 以這兩個珍貴的文物為契機，博物館組織開始被具體的規劃與執行。

¹² 新加坡圖書館的會員分成三個階級：第一級為共同持有人 (Proprietors / Shareholders)，須繳納入股費 30 叻幣 (1 叻幣約等於 2 先令 4 便士)，以及只要股東居住在新加坡期間，便需要繳交每月 2.5 叻幣的月費；第二級會員 (Class II) 是為了使當地居民也能在不成為共同持有人的前提下，使用新加坡圖書館暨博物館，須繳納每月 2.5 叻幣的月費，並將姓名登記在圖書館中，並由館員公告給委員會；第三級會員 (Class III) 是針對短暫居留者以及外國人，申請方式以及月費標準同第二級會員，惟須在申請時由一位當地居民擔當保證人，以確保書籍的歸還。1848 年又再增加了第四級會員 (Class IV)，每月需繳納 1 叻幣的月費，但不能夠享有外借書籍的權力。

¹³ Richard Hanitsch,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p. 529.

¹⁴ 一直到 1862 年新加坡圖書館搬遷至市政廳 (Town Hall，現維多利亞劇場 (Victoria Theatre)) 為止，該館一直長期向新加坡書院借用北翼建築，作為圖書館與辦公空間。

¹⁵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p. 8-11.

巴德沃爾在寫給新加坡圖書館的信件中表明道：

在羅根 (J. R. Logan)¹⁶ 的建議下，……隨信附帶的金幣，將會被適當地安置在該機構的閱讀室中，並作為一間最終目的是要去展示馬來亞歷史 (Malayan History) 的博物館的核心。……

您願意接受這兩枚貨幣，並將其展示在新加坡圖書館中，會使我能夠滿懷歡喜地回覆予尊貴的印度王公。¹⁷

新加坡圖書館在收到殖民地總督委託信件的兩天後，便召開了當年度的共同持有人會議。在會議中針對殖民地總督的要求，提出了下面的解決方案：

此提案由考德威爾 (H. C. Caldwell)¹⁸ 先生提出，弗雷澤 (L. Fraser)¹⁹ 先生附議並由全體共同持有人一致同意，一間以收藏能夠展示歷史發展 (general history)、新加坡考古以及東方諸島 (Eastern Archipelago) 為主要目的的博物館將成立於新加坡圖書館中。該館將命名為「新加坡博物館」 (Singapore Museum)，並在新加坡圖書館的一個房間中展示。²⁰

兩個月後，博物館執行委員會²¹ 會議紀錄中，呈現了對於該館發展的詳盡規劃。從博物館的收藏政策中可以見到，儘管該館成立的宗旨是以呈現馬來亞地區的考古與博物誌文物為主，但仍然會收藏藝術類的物件。²² 1850 年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在這段期間，博物館也陸續收到各樣的物件，然而可惜的是當時並未留下具體的館藏清單，我們只能仰賴官方與捐贈者、殖民政府的來信，來窺看當時的新加坡博物館中擁有什麼藏品。在這些往來的信件中，可以看到當時收進的館藏包含四件古老的伊斯蘭教墓碑、一件馬來亞墓碑、原住民的武器、自然史的

¹⁶ James Richardson Logan (1819-1869) 新加坡圖書館創始的三十四位共同持有人之一，名冊中記載其為公證人以及法律顧問；他同時也是 1847 年創刊的《印度群島與東亞期刊》 (*The 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JIAEA)) 創刊者與主編。資料來源：National Library Board, James Richardson Logan: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146_2009-10-27.html> (2019/4/01 瀏覽)；Richard Hanitsch,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p. 527.

¹⁷ Richard Hanitsch,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p. 532.

¹⁸ H. C. Caldwell 新加坡圖書館創始的三十四位共同持有人之一，名冊中記載其為司法資深書記官。

¹⁹ Lewis Fraser 新加坡圖書館創始的三十四位共同持有人之一，名冊中記載其為商人。

²⁰ Richard Hanitsch,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p. 533.

²¹ 1849 年 3 月 30 日召開，與會成員包含主席 H. C. Caldwell 與 L. Fraser，執行委員 R. Bain, R. Little, G. G. Nicol, M. F. Davidson, A. Logan, J. H. Campbell 與 J. C. Smith。

²² 1849 年 3 月 30 日會議記錄，第三章第五節第四點，原文為“Implement, Cloth or other articles of Nature, Art, or Manufacture.” 參見 Richard Hanitsch,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p. 535.

圖像等。

此外，新加坡圖書館與博物館也持續地每月向倫敦的書商購入新的書籍。但即便在 1853 年與航運公司 P. and O. Co. 達成協定，同意圖書館僅需支付航運的費用，來取得新的書籍與報紙，對一個私營的組織而言，龐大的郵務費用仍舊是一筆沈重的營運成本。且在 1845 到 1852 年間，陸續有共同持有人出售自己的股份，降級為第二級會員，而原本第二級與第三級的會員數量也開始陸續下降，為後來的財務危機留下了伏筆。財務上的困難，同樣也反映在對館舍的經營上。即便在博物館開館後的幾年內，一直都有收到新的館藏品，然而從年度報告以及當時的新聞報紙中來看，博物館並未受到太多的重視，而在資金分配上也不是主要運用的對象。

1862 年為了尋求更大的館舍空間，新加坡圖書館從原本新加坡書院，搬到了市鎮廳（Town Hall, 現維多利亞劇院（Victoria Theater）），並在搬遷後聘用了一位圖書館員兼博物館研究員（Librarian-curator）柯林斯（James Collins, 1862-1877 年間擔任研究員）。²³ 然而館舍的搬遷作業以及新聘人員的費用，再加上不斷減少的會員數量，圖書館與博物館在同年十月爆發了財務危機：

圖書館的財務主管與我（Dr. Scott）十分震驚且不悅的發現，前任秘書長史密斯（J. C. Smith）先生留有一個不利於圖書館的帳目，高達近 70 英鎊！這對委員會而言如同晴天霹靂般，委員會們一直認為圖書館是沒有負債的。²⁴

由於年度報告以及報紙的遺失，²⁵ 從 1866 年到 1872 年有關新加坡圖書館暨博物館的資料十分的稀少。目前只能從工商名錄（Directories）中得知圖書館還是有在營運的，然而在現存的資料中，卻未提及博物館的營運狀況，因此可以推測當時博物館組織可能因為資金困難，而暫停營運或是被委員會忽視。

（四）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1874-1942）

新加坡圖書館暨博物館的營運在 1874 年迎來了轉機。1873 年 5 月殖民地部長（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向海峽殖民地議會（Legislative Assembly）

²³ James Collins，蘇格蘭植物學家。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Library (1845-1874):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653_2005-02-03.html?s=Singapore%20Library> (2019/4/05 瀏覽)

²⁴ Richard Hanitsch,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p. 541.

²⁵ 1864 年由新加坡書院發行的 *Singapore Free Press* 停刊，直到 1884 年復刊。1863-1870 年間，海峽殖民地政府發行的 *Straits Times*，在 Hanitsch 寫作的時代便已佚失，直至今日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的檔案中仍未收錄。

提議在南肯辛頓博物館 (South Kensington Museum)²⁶ 中，給予每個殖民地合理的預算，來建立與維持一個「殖民地物產常設展」 (Permanent Exhibition of Colonial Products)。²⁷ 在這個展覽中的展品，不只是具商業價值的物品，而是任何與殖民地相關的物件，如古物與民族學的插圖、自然史以及任何該地區的特色物件。²⁸ 這個提案很快便被議會同意，並且提供預算來支持這場展覽，然而此一計畫最終並未實現。

同年 12 月，海峽殖民地首席醫療官 (Principal Civil Medical Officer of the Strait Settlement) 蘭德爾 (H. L. Randall) 寫信向殖民地部長提出，需要在新加坡成立一個博物館用來蒐藏自然史物件。時任殖民地總督克拉克 (Andrew Clarke) 同意了這項要求，並再更進一步的建議博物館要包含一座公共圖書館。1874 年 5 月博物館與圖書館籌建委員會成立，並委託利多博士 (Robert Little) 擔任主席，而利多博士正好也是新加坡圖書館暨博物館的主要共同持有人之一。隨著新加坡圖書館暨博物館的財務狀況每況愈下，共同持有人們早在 1850 年代就曾尋求政府的資助，然而都未得到正面的回覆。而此時殖民地政府的新建計畫，對新加坡圖書館暨博物館而言，便如同一道曙光般，不但能解決長久以來的財務問題，更能進一步的達到圖書館暨博物館成立的初衷：推廣、保存、紀錄與展示馬來亞地區的考古與自然文化。於是，在經過一連串的協商後，政府最後同意以 560.71 英鎊的價格買下新加坡圖書館暨博物館，並讓這些原持有人擁有使用圖書館及博物館的特權。1874 年 9 月新加坡圖書館暨博物館更名為「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

然而，長期擔任共同持有人的利多博士深知，即便圖書館暨博物館已經搬遷到新的館址，且也在 1874 年重新開館後，獲取了更多的展示與收藏空間，²⁹ 但要同時作為圖書館、閱覽室、博物館，這樣的空間仍舊是十分不足的。早在 7 月，籌備委員會便曾向政府提出圖書館暨博物館需要更大空間的需求。這個提案並沒有立刻被接受，而是直到 1876 年 12 月圖書館暨博物館又搬回到了萊佛士書院 (原本的新加坡書院) 後，空間不足的窘境才稍獲紓解。而完全為圖書館暨博物館建設的新建物，更是要到 1887 年才出現。

²⁶ 南肯辛頓博物館於 1852 年成立，座落於倫敦南肯辛頓公園南側，為收藏與展示 1851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 (the Great Exhibition) 中，具有教育意義之工藝、藝術、文化、科學、自然史等物件的永久典藏機構，今日發展成為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 Albert Museum)、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 以及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

²⁷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p.11-12

²⁸ Richard Hanitsch,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p. 542.

²⁹ 1874 年，原本駐紮市政廳樓上的政府單位，讓出使用的三個房間，供給圖書館暨博物館做使用。

在殖民地政府接手圖書館暨博物館後，博物館的館員便開始對這些館藏進行分類與建檔。但是因為圖書館暨博物館早期的物件（包含書籍）絕大多數都是仰賴民間的捐贈，而這些捐贈的規模有大有小，再加上許多的館藏（特別是針對人類學物件的館藏）是由共同持有人們獨自買進後，再逕行放進圖書館暨博物館收藏之中，因此有許多的物件是沒有做到進館登錄，甚至完全缺乏相關的紀錄文件，這也明顯的造成了在成為公家機構後，要對這些館藏進行登錄與建檔作業的困難。³⁰ 在長達數年的期間，在缺乏歷史脈絡的紀錄下，有關人類學考古的物件，都只能被放在一旁而未受到重視。

人類學的收藏品，主要是用來描繪以及去提供一個針對生活型態，以及在這套收藏中呈現的不同習俗的人們間，確切且現成的比較。一套人類學收藏的價值，應該是來自於系統的建立，並且有一個明確的目的；所有的物件都應該被小心且恰當地標示……未被標示的古物是不值得被安置與關心的。而現在在博物館中的人類學展品，即是沒有標籤與歷史的……。³¹

博物館對人類學考古物件的冷漠，也出自於研究員個人的喜好與專長。1877年原本擔任圖書館員兼博物館研究員的柯林斯，因為多次的行政疏失而被解僱，取而代之的是時任華民護衛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副署長（Assistant Protector）丹尼斯博士（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1839-1900, 1877-81年間擔任研究員）。³² 丹尼斯在來到新加坡之前，曾在香港博物館（The Hong Kong Museum）擔任研究員，同時他也是中國郵報（China Mail）的編輯與所有人。因此當他在1877年來到新加坡時，便很快地受到博物館暨圖書館執行委員會的注意，並延攬為兼職的圖書館員與研究員。柯林斯在擔任研究員的期間，由於缺乏管理、展示收藏品以及維持博物館的經驗，因此在過去15年間，博物館確切新增了什麼館藏以及在搬遷的過程中，出售了什麼館藏，官方皆未留下第一手的資料。但是可以確定的是，1874年重新開館時，在所有收藏當中，有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物件的館藏數量是十分充足的。³³

³⁰ Megan S. Osborne, "Early Collector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The Heritage Journal* 3(2008): 4.

³¹ Straits Settlements,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Annual Reports 1893* (Straits Settlements: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1893). p. 8.

³²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 20.

³³ 柯林斯在擔任館員的期間，便曾為館方購入大量的植物標本；此外，在1874年為了要準備參加將在1876年於菲律賓舉辦的「美國獨立百年紀念國際博覽會」（Centennial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英國先行在澳大利亞舉辦了「墨爾本殖民地博覽會」（Melbourne Intercolonial Exhibition）。在1874年博覽會中對各殖民地政府募集了各樣的展品，並將從這些展品中挑選，將代表英國殖民地前往1876年博覽會展示的物件。而海峽殖民地展示物件的籌備，便是由當時的新加坡圖書館暨博物館負責，而從展出的目錄中，可以得知該館當時主要擁有的

丹尼斯博士在接手研究員的工作之後，立刻著手對現有的展示方式進行改善。從 1877 年的一篇報導中，可以見到對博物館陳設以及圖書館編目所帶來的改變：

我們很榮幸能夠親自來見證萊佛士博物館，在經過秘書長丹尼斯博士的辛勤重置下，在展示上面的改變；或者說，是從長久以來沈寂、雜亂的物件中，創造出來的展示。十四個展櫃，整潔誘人的外表，裝滿了各樣的標本，一些是極為珍貴的，但大多數都具有趣味。對圖書館本身的改善，更顯著地影響參訪者：(對牆面的) 些許塗漆與修飾工程帶來了驚人的效果；對書籍依照各樣的標題仔細分類，將會提供未來的讀者更為輕鬆的方式來查閱所需的資料。³⁴

丹尼斯博士的改善工程對參觀的品質顯然有很大的幫助，1878 年的報導指出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顯然已經成為了當地的熱門景點，每日都有 1,500 到 2,000 名訪客來訪，且絕大多數都是「當地的各階級人士」。³⁵ 這反映了圖書館暨博物館在功能上的改變：丹尼斯博士消去了過去奇珍異寶展示室的陳列方式，改以特定的分類方式展示物件，並加上標籤說明展品，這代表著博物館將預設的觀眾，從過去特定的知識階層，轉變成一般公眾。而博物館的定位，也從過去向外來者展示殖民地政府，轉變成提供當地居民教育與娛樂的場所。

丹尼斯博士在 1882 年卸任研究員的身份，但仍然擔任圖書館暨博物館委員會的成員直到 1889 年離開新加坡為止。在丹尼斯博士卸任後，圖書館暨博物館又陸續聘用了幾位兼職的研究員，但在職時間都不長。而也是在丹尼斯博士卸任後，委員會決議將圖書館員與研究員變成兩個專門職位，不再互相兼任，一方面減輕僱員的業務量，同時也希望能夠讓僱員專注於所長。但直到 1887 年，圖書館暨博物館才正式聘用了一位全職的研究員戴維森 (William Ruxton Davison, d. 1893)。³⁶

1887 年 8 月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新館落成，³⁷ 並在同年 9 月搬入新館，10 月正式對外開放。新館舍的啟用以及新的展示方式，讓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持續地吸引著大量的遊客前來參訪，同時也有許多的遊客來信要求在夜間開放博物館暨圖書館，然而基於安全考量，都被戴維森拒絕了。³⁸ 在 1887 年到 1891

館藏，著重於自然史的各類物件。

³⁴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15 Sep. 1877.

³⁵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19 May 1878.

³⁶ William Ruxton Davison (d. 1893)，英國鳥類學家與收藏家，1887 至 1893 年擔任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研究員。

³⁷ 即是現在座落於史丹佛路上的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³⁸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 44.

年間，圖書館暨博物館的參訪人數不斷地上升，於此同時博物館也不斷地購入新的館藏，特別是在原有的自然史館藏基礎上，陸續購入了許多動物標本。然而在缺乏明確的典藏政策下，新購的館藏不免呈現雜亂無章的景況，且增加的速度遠超過戴維森的預期。而數量龐大的館藏，也開始佔據展示的空間與彈性，讓參觀品質下降。戴維森在 1889 年的年度報告書中，便提出了要制定典藏政策的建議：

我認為應該將博物館（展覽）的內容，限制在馬來半島以及與其相鄰的、在動物學上具關聯性的國家，……。³⁹

而戴維森的意見也確實被落實在後來博物館在採購、或是受贈物件時的決策上。例如在 1892 年，博物館購入了其最具代表性的藏品：一套印度洋亞種藍鯨（*Baleaenoptera indica*）的骨骸標本。

然而館員對於新入館藏的分類速度，似乎是不及館藏的增加速度，也讓原本具有完整規劃與標示的展間，開始出現擁擠與雜亂的現象。而參觀品質的降低，也反映在參訪人數上。1892 年，一直呈現成長的參訪人數首次出現下降，為了改善這個情形，戴維森提出了要重新規劃整個展覽的內容，並將原作為研究員宿舍的空間，改為展覽室以增加展示空間。然而 1891 年戴維森的妻子不幸去世，戴維森因此罹患憂鬱症與嚴重酗酒問題，最終於 1893 年 1 月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⁴⁰

戴維森雖然擔任研究員的時間並不長，但對博物館發展的影響卻不亞於丹尼斯博士。特別是在典藏政策的制定上，以及對收藏地域的劃定等，皆被延續到後來主要繼承這批自然史文物的李光前自然史博物館（Lee Kong Chian Natural History Museum）⁴¹ 的典藏政策與博物館定位上。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在戴維森逝世之後，又陸續聘用了幾位研究員，並度過了一段安穩的時期，同時也持續擴張在科學研究與典藏，以及公共教育與娛樂機構的能力。

哈尼奇博士在 1895 年接任博物館研究員以及委員會秘書長之前，因為薪資爭議導致博物館有長達 18 個月的時間沒有研究員。因此，當時博物館的展品與展間陳設狀態不理想，迫使哈尼奇博士必須將部分的展廳關閉，重新規劃整理後才再次對外開放。這樣的過程長達了六年之久，直到 1901 年博物館才回到了正

³⁹ Straits Settlements,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Report on the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th September 1889* 轉引自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 45.

⁴⁰ *Strait Times Weekly Issue*, 22 Feb. 1893.

⁴¹ 1976 年新加坡政府重新思考了萊佛士博物館（戰後更名為國家博物館）的定位，並在隔年將自然史文物分別移轉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以及新加坡科學中心（Science Centre Singapore）中，而新加坡國立大學更在後來成立李光前自然史博物館（Lee Kong Chian Natural History Museum）專門展示這批收藏。

軌上。⁴² 在整理的過程當中，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又再次面臨到了館舍空間不足的問題，哈尼奇博士在年度報告中，多次的向政府提議要擴建博物館，直到 1904 年這個提議才被接受，新的館舍在 1907 年正式落成開館。

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在哈尼奇博士任職時期，依然接受大量來自外界的捐贈，包含如歐洲的探險家、傳教士、收藏家等。哈尼奇博士也藉由這此重新整理館藏與展廳的過程，對既有的收藏品進行盤點與紀錄，並在 1908 年首次出版了該館的館藏目錄，也是目前可以見到對該館館藏最早的彙整資料。哈尼奇博士在 1919 年退休，回到英國繼續他的個人研究，在他之後繼任的三位研究員兼館長，持續地在他所建立起的基礎上壯大博物館的收藏與展示，為後來的李光前自然史博物館、國家博物館以及新加坡科學中心等繼承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綜上所述，在 1965 年前的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的發展與營運，多仰賴個別研究員的努力與專業。即便有如丹尼斯博士等人，確立了博物館的定位與收藏方針，但若在缺乏研究員的指示與推動下，博物館仍舊難以在僅有工作人員的情況下，順利推出新的展覽以及規劃維護展品與展間。這種對研究員高度仰賴的情況，到了戰後日軍撤離並將博物館歸還給新加坡政府後，開始逐漸有了改善。到了 1965 年獨立建國後，新一代的研究員與新的博物館概念進入新加坡，又將圖書館暨博物館帶往下一階段的發展。

二、向專業化邁進：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新加坡的科學與文化機構，自日佔時期開始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博物館、植物園與圖書館等機構，開始由專業領域相關的學者，先後擔任館長、研究員或主席等職務，從根本上強化了這些機構的學術研究能力，使得這些原本僅作為典藏、保存以及娛樂功能的場所，更朝向現代博物館需具備有研究能力的定義邁進。1969 年新加坡走出獨立建國初期的動盪後，政府更是大力的推動國家層級的博物館發展計畫，陸續成立了許多專門的博物館機構，已成為國家博物館的萊佛士博物館更是在這個計畫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國家博物館也在這波再定位的決議中，重新審視了自身的館藏與博物館發展的走向，重新定調為「展示新加坡歷史文化」的博物館，而將自然科學類的館藏移出，也進一步成立了藝廊，讓博物館整體發展從自然科學導向轉為人文歷史走向。

(一) 日佔時期與直轄殖民地時期 (1942-1957)

⁴² Megan S. Osborne, "Early Collector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The Heritage Journal*, p. 5.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隨即陷入戰火之中。隨著德義日同盟關係的建立，亞洲地區也隨即被捲進了這場大戰之中，作為歐洲各國主要殖民地地區的東南亞，當然也受到了戰火的波及。1941 年 12 月日本轟炸珍珠港後，隨即出兵攻打馬來亞、泰國以及香港。1942 年 2 月 15 日時任英國馬來亞陸軍總司令白思華 (Arthur Percival, 1887-1966) 中將戰敗向日本投降，⁴³ 標誌著馬來亞半島，包含新加坡，全境淪陷直到 1945 年 8 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成為日軍的佔領地長達三年半之久。

然而，戰爭並未對圖書館暨博物館建物或是當中的藏品造成太大的破壞，且在日佔時期博物館仍舊持續地對外開放。1942 年 4 月 29 日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改名為「昭南博物館」(Syonan Hakubutsu Kan)⁴⁴ 重新開館。圖書館暨博物館以及當時許多的文化資產能夠不受到戰火的波及，要歸功於兩個重要的人物：時任新加坡植物園 (Botanic Gardens)⁴⁵ 副園長康納博士 (Edred John Henry Corner, 1906-1996)⁴⁶ 以及隨日軍前來的地質學家田中館秀三 (Tanakadate Hidezo, 1884-1951)⁴⁷ 兩人的努力，跨越了敵我的分界共同保護這些珍貴的科學與文化遺產。

康納博士在 1929 年來到新加坡擔任植物園的副園長，日軍佔新初期他與其他英國人一同被軟禁，然而他向日軍表明自己的身份且願意服務於日軍，換得繼續擔任副園長的資格。⁴⁸ 康納與當時被指派為博物館館長兼植物園園長的田中館秀三博士，都認為戰爭不應該破壞這些珍貴的科學以及文化產物，在這樣的共同認知之上，兩人建立起了緊密的合作關係，並一同向當時指揮馬來亞戰役的日軍將軍山下奉文 (Yamashita Tomoyuki, 1885-1946) 提出建議，說明日軍應該要保護這些科學收藏、圖書文獻以及任何歷史性的文物，特別是圖書館暨博物館以及植物園，並且得到時任日本陸軍大將東條英機 (Hideki Tojo, 1884-1948) 的支持。東條英機曾直接要求所有司令部：

⁴³ 白思華的投降被認為是「英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難和最大規模的投降」(The worst disaster and largest capitulation in British history)，大大的削減了英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威信，進而在戰後失去在該地區的統治權力。而白思華的部署與備戰工作也被認為是這場戰役的最大敗因。Alan J. P. Taylor,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57.

⁴⁴ 日佔時期，日本將新加坡稱為「昭南島」(Syonan To)。

⁴⁵ 1822 年由萊佛士爵士創建，旨在評估該地區有潛在經濟價值作物，包括高產的水果、蔬菜、香料等。1874 年由殖民政府接管，開始研究橡膠樹的栽種，進而讓後來的馬來西亞成為世界最主要的天然橡膠生產以及出口國。現為新加坡植物園並在 2015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

⁴⁶ Edred John Henry Corner (1906-1996)，英國真菌學家 (mycologist)。

⁴⁷ 田中館秀三 (1884-1951)，日本東北大學地質學家，為日本知名地球物理學家田中館愛橘 (Tanakadate Aikitu, 1856-1952) 的養子，在 1942-1943 年間擔任植物園與博物館館長，後由郡場寬 (Kwan Koriba, 1882-1957) 接任。

⁴⁸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 96.

圖書館與博物館中的收藏以及所有科學藏品，都應以保障人民權益之名，被保存且維持在其原本所屬的國家中。⁴⁹

山下奉文將新加坡植物園更名為「昭南植物園」以及將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改名為「昭南博物館」後對外開放。這兩個學術機構在日佔時期，仍舊持續地扮演著科學研究以及文物典藏的功能。即便在戰後的今日，對於康納博士的立場評價兩極，⁵⁰ 但不可否認的是新加坡地區許多的歷史、文化、科學研究得以保存甚至於持續的發展，極大一部分都要歸功於康納博士的努力與勇氣。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終結。隨著日軍的撤離，1946年4月1日新加坡回歸英國管轄，成為直轄殖民地的一員。政治上的轉變並未對博物館暨圖書館帶來太大的影響，在恢復原本的館名後，博物館依舊如尋常般地對外開放。同年，博物館迎來了新任的館長特韋迪 (Michael Tweedie, 1907-1993)。⁵¹ 特韋迪早在二戰前便已擔任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的助理研究員，對於該館既有的館藏早已十分熟悉，戰後特韋迪的首要工作便是清點在戰爭期間，受到破壞或是遺失的藏品並追蹤其下落，以作為戰後審判的依據之一。⁵² 在戰後工作到一段落後，特韋迪開始著手博物館的改善工程。

1948年博物館迎來了一些改變，首先是館舍的翻新，將內外牆重新粉刷新與整修，提供了更好的參觀空間；⁵³ 其次，針對動物學展廳的標籤，增加了簡短的介紹文，說明該生物的習性、原生地等資訊，而攝影以及示意圖等輔助工具，也適當地被安排於展場中。也為了要製作這些新的標籤，許多的展品被撤下，以便進行更仔細的研究。⁵⁴ 於此同時，為了能更加專業化展品的研究，博物館的組織也有了更動。1949年，研究員與助理研究員的職務被重新規劃，分為人類學研究員 (Curator of Anthropology) 以及動物學研究員 (Curator of Zoology)，分別由柯林 (Hubert Dennis Collings, 1905-2001) 與吉普森－希爾 (Carl Alexander

⁴⁹ Edred John Henry Corner, *The Marquis: A Tale of Syonan-to*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81) 轉引自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 99.

⁵⁰ 反對者認為，康納博士向日軍投誠以換取持續擔任副館長職務，以及得以持續進行研究的舉動，是協助侵略者以及支持日軍的作為；支持者則站在知識無國界的角度，正面肯定康納博士為學術研究的貢獻與犧牲，更引用其在戰後出版的回憶錄《侯爵：昭南島的故事》 (*The Marquis: A Tale of Syonan-to*, 1981) 中，並未美化日軍作為且斥責日軍屠殺華民，以及強調自身與上司間，依舊是俘虜與監視者關係的言論，來佐證康納博士並非是支持日軍，僅是為保存學術成果而做出的妥協。

⁵¹ Michael Tweedie (1907-1993)，英國博物學家與考古學家，於1932至1941年間擔任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助理研究員，並於1946年至1956年間擔任該館館長。

⁵²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p. 111-112.

⁵³ Singapore,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Report on the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for the Year ending 31st 1948*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49)

⁵⁴ Singapore,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Report on the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for the Year ending 31st 1948*.

Gibson-Hill, 1911-1963) 擔任。在三人的共同努力下，博物館順利地在十年間完成展品資訊上的更新，提供給觀眾更詳細的資訊，同時也為馬來亞地區的生物學研究提供許多新的發現與突破。即便新加坡在 1950 年代正經歷劇烈的政治動盪，然而這並未對博物館的營運與研究帶來實質上的影響。

(二) 邁向國家博物館 (1957-1976)

1957 年博物館暨圖書館迎來了一項重大的變革。自 1823 年成立以來，便一直共存的圖書館暨博物館組織，隨著《第 30 號法令》以及《第 31 號法令》⁵⁵ 的頒布正式分離為兩個獨立的組織。然而在組織變更之前，博物館與圖書館的分離早在 1953 年便已開始進行，起因於慈善家李光前 (Lee Kong Chian, 1893-1967)⁵⁶ 捐贈了一筆鉅額的善款，期望在新加坡建立一座免費的公共圖書館。⁵⁷ 李光前捐贈的附帶條件是，這座圖書館必須要包含有亞洲語言以及英文的書籍，以呈現新加坡當地居民的文化以及語言特色。而殖民政府也同意支付所有超出李氏捐贈金額的費用，且願意將萊佛士圖書館中的藏書移到新的圖書館中。⁵⁸ 隨著新圖書館成立計畫的出現，博物館於 1954 年成立了規模較小、較為專業的博物館圖書館，專門收藏有關動物學、人類學與考古學相關的書籍與期刊。⁵⁹ 同年，博物館也決議並獲准開展長達四年的翻修計畫，將展示廳進行現代化的更新。隨著圖書館的遷出以及展示廳的翻新，博物館持續地迎來新的藏品，包含如：一套約 360 隻的珍貴蝴蝶標本、巨大的眼鏡蛇標本，以及著名生物學家華萊士博士 (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⁶⁰ 的手稿等。⁶¹

從 1957-1965 年間，新加坡的政治體制有十分劇烈的動盪與轉變。1957 年 8 月 1 日，英國國會通過《新加坡邦法》(State of Singapore Act)，將新加坡從殖

⁵⁵ 《第 30 號法令》又稱《萊佛士博物館法令》(the Raffles Museum Ordinance)，當中政府將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成立為一個獨立的法人，並將圖書館從博物館組織中分離。《第 31 號法令》又稱《萊佛士圖書館法令》(the Raffles Library Ordinance)，將原本隸屬於博物館中的圖書館，單獨成立為萊佛士國家圖書館 (Raffles National Library)，並作為一個獨立且免費的國家公共機構。

⁵⁶ 李光前 (Lee Kong Chian, 1893-1967)，新加坡華僑。創辦南益集團，為世界十大富商之一。李光前大力支持教育與文化活動，成立李氏基金會，出資協助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諸多學校、圖書館等文化教育機構的建立。1962 年更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首任校長。

⁵⁷ National Library Board, Lee Kong Chiang: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978_2006-06-16.html?s=lee%20kong%20chian> (2019/4/22 瀏覽)

⁵⁸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 119.

⁵⁹ Government Printer,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Report on the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for the Year ending 31st December 1954*.

⁶⁰ 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英國博物學者、探險家、地理學家、人類學家和生物學家，以提出「天擇」演化論而聞名，該理論後來成為達爾文演化論的重要基礎之一。1854-1862 年間在馬來群島進行研究。

⁶¹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p. 119-120.

民地的地位提升到擁有內政自主權的「邦」的地位，並開始有了民選的領導人與議會產生，同時也提出了具體的時程規劃，要將新加坡帶向獨立建國的最終目標。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在經歷短暫的獨立建國後，⁶²正式併入馬來西亞聯邦，成為聯邦十四州之一，直到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正式獨立建國。⁶³國家政體的劇烈轉變與層出不窮的種族抗爭事件，讓新加坡社會開始凝聚重視公民教育以及形塑國家意象的共識。希望透過了解以及回顧新加坡的歷史，讓新加坡地區的人民能夠擁有一個超越種族與宗教的共同國家意識。在這樣的期許之下，1960年萊佛士博物館正式更名為「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隸屬於文化部 (Ministry of Culture) 之下。⁶⁴更名之後，博物館肩負了新的社會責任，時任邦元首伊薩 (Yang di-Pertuan Negara, Yusof bin Ishak, 1910-1970)⁶⁵在國會說明了國家博物館新的身份定位：

國家博物館將會扮演一個更能展現當地風俗與傳統的角色。我們將會更加重視文化材料，並試圖編織出馬來亞文化 (Malayan Culture)。我們也會更重視在朝向現代新加坡的道路上，各族群的歷史與貢獻。⁶⁶

從上段的引言中不難發現，此時的國家博物館開始出現根本性的轉向：從原本以科學、研究與教育的機構，轉變成肩負建立國族意象、展示與呈現人文歷史發展的國家機構。然而，即便有了邦元首的宣言，但在1976年國家博物館藝廊成立之前，國家博物館仍不斷的在自然科學與人文歷史的走向中擺盪，並持續思考著做為一個國家博物館，該如何運用既有的館藏來詮釋其被賦予的新定位。

(三) 國家博物館再定位 (1976-1988)

1976年國家博物館重回文化部的管轄，⁶⁷並對國家博物館的角色，重新提

⁶² 1963年8月31日時任總理李光耀 (Lee Kuan Yew, 1959-1990) 為使新加坡先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後，再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在未知會英國的前提下，逕行在政府大廈前舉行獨立儀式，宣布新加坡獨立。透過此一舉動，向馬來領袖們施壓，要求新加坡得已以較優的條件加入聯邦。然而8月31日的獨立並未收到各國的承認，也未受到聯合國的認可。

⁶³ 陳鴻瑜，《新加坡史增訂本》(新北：商務印書館，2017)，頁70-102。

⁶⁴ Singapore (1960), *the Raffles National Museum (Change of Name) Ordinance*, No. 67 of 1960. 轉引自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 121.

⁶⁵ Yusof bin Ishak (1910-1970)，在1959-1970年間擔任新加坡邦元首 (Yang di-Pertuan Negara)，為新加坡首位馬來亞出身的邦元首。

⁶⁶ 原載於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 Vol. 13 20 July 1960, col. 24. 轉引自 Kevin Y.L. Tan,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 121.

⁶⁷ 1968年科學與科技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成立，為了整合國家博物館既有的自然科學藏品與即將成立的自然科學博物館，在1968年至1976年間，國家博物館被移轉到科學與科技部的管轄之下。

出了更為明確的定位：

（文化部）將會把公共長廊的一部份轉為藝廊，並將國家博物館作為人類學與藝術博物館發展。⁶⁸

值得注意的是，「藝術」一詞首次出現在博物館的發展規劃之中。然而，過去博物館的主要收藏對象，都是以自然科學類的物件為主，這些原本作為展示大宗的物品都將全數移轉給科學理事會（Science Center Board），⁶⁹ 展示於 1977 年新設立的科學博物館中。⁷⁰ 面對藏品大量移出的狀況，文化部要如何將博物館發展成為「人類學與藝術博物館」呢？博物館過去所建立的收藏中，擁有足夠的展品來填補自然科學類物件移出後的展場嗎？這類的疑問在 1976 年 8 月國家博物館藝廊開館時，館方所出版的《國家博物館藝廊於 1976 年 8 月 21 日正式開放》（*National Museum Art Gallery Official Opening, 21 Aug. 76*）中可以找到一些初步的解答。

順應著展品的移轉與重新調整，以及國家博物館藝廊的開幕，館方出版了《國家博物館藝廊於 1976 年 8 月 21 日正式開放》一書，盤點了過去較未受到重視的有關物質文化、視覺文化以及藝術類的藏品。在開館當時，主要的藏品多集中在史前的考古文物、馬來亞地區的人類學物件、中日貿易的瓷器與銅器等。⁷¹ 而藝術類的藏品主要有以下幾類：

[...] 描繪舊新加坡的地圖、油畫、平版印刷、版畫和攝影；舊新加坡時期政府官員以及其他歷史人物的肖像畫；陸運濤（Loke Wan Tho, 1915-1964）⁷² 收藏中的當代馬來亞西亞和新加坡藝術家的作品；一套初始的核心收藏，針對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其他東南亞地區藝術家的繪畫和雕刻；以及其他。⁷³

從上述的引言中可見，藝廊開館時博物館所擁有的藝術類收藏，應該是略顯單薄的。當中較具有規模性的收藏來自於陸運濤先生，在 1960 年代贈與博物館

⁶⁸ “Culture Ministry Will Take Over Museum,” *Strait Times*, 31 Mar 1972.

⁶⁹ 1970 年科學與科技部宣布要成立一間新的科學博物館（Science Center），作為展示新加坡科技、工藝的發展以及呈現生命科學的演進。新的博物館於 1977 年落成並正式開放。新加坡科學理事會便是作為籌備科學博物館的執行單位。

⁷⁰ 在 1977 年新的科學博物館成立前，這些藏品仍舊集中在國家博物館中展示。

⁷¹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National Museum Art Gallery official opening, 21 Aug. 76*.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76)

⁷² 陸運濤（Loke Wan Tho, 1915-1964），新加坡鳥類學家、攝影師以及電影製片人。生前曾捐贈給國家博物館 99 件當地藝術家的繪畫、素描以及自己的攝影作品。National Library Board, Loke Wan Tho: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782_2005-01-19.html> (2019/4/25 瀏覽)

⁷³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National Museum Art Gallery Official Opening, 21 Aug. 76*.

的私人收藏，包含馬來亞地區的當代藝術家畫作、素描以及自己的攝影作品，合計共 99 件。其餘的藏品多源自於早期殖民政府所留下的各類肖像畫，以及少部分來自捐贈的物件，然而這些物件確切是在何時進入到博物館收藏中，並未有明確的文件記載。

除了對展品有大致的描述外，博物館也再次對自己的功能與角色，提出了具體的說明：

因此，國家博物館的角色與功能將是作為一個儲存國家文化遺產之處。透過募集捐贈、增加與優化收藏品；作為一個完善的展示中心，去賦予展品意涵並促進觀者對展品更好地理解與鑑賞；最後但同樣重要的，作為一個文化與教育的機構來服務社會，透過提供社會大眾能夠個別參與博物館計畫活動的方式，使每一次拜訪國家博物館，都可以獲得極富文化與教育價值的個人體驗，同時也能享有樂趣。

為達到此一目的，國家博物館將致力於打造自身成為享受以及理解本國與周圍國家文化的視覺中心。這意味著要擁有一套強而有力的永久收藏、對常設展覽的長遠規劃，以及縝密安排的推廣活動去建立與公眾之間的對話，而這樣的對話會刺激公眾對於文化、藝術以及創意的參與。⁷⁴

從這份宣言中可以見到，回歸文化部的國家博物館開始有了十分明確的目標與任務，且更大程度的擔當起了新加坡文化教育推廣者的角色。而國家博物館整體而言，也開始具備有現代博物館的概念，而非僅止於被動地收藏、展示與研究。而從收藏的範圍而言，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雖然是作為「新加坡的國家博物館」，但該館卻未將自己的格局侷限於國境之內，而是將收藏的目標甚至於目標觀眾的設定，都擴展到整個馬來亞與東南亞地區，這也連帶的影響到了日後新加坡整體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國家藝廊的政策方向。

國家博物館這樣的政策制定，除了考慮到主政者的理想與野心外，新加坡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氛圍，某種程度上也對博物館施加了無形的壓力，必須要呈現區域文化的樣貌。在 1950 到 60 年之間，新加坡爆發了多次的衝突事件，而這些衝突事件不外乎圍繞在幾個核心議題之上：一、新加坡是否要加入馬來亞聯邦，以及又該如何加入馬來亞聯邦；二、國家領導群長期由華人主導，引發其他族群的不滿；三、共產勢力的擴張。⁷⁵ 在這之中，種族的議題又扮演著更為關鍵的角

⁷⁴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National Museum Art Gallery official opening, 21 Aug.* 76.

⁷⁵ 陳鴻瑜，《新加坡史增訂本》，頁 69-112。

色，因此一個國家博物館應該要去呈現該國不同種族、宗教與文化的多樣性，似乎變成一種政府能夠宣示自己對於多元文化的重視的管道之一；⁷⁶ 而展示馬來亞地區各國的文化，以及強調其與本國之間的鏈結，也能強化新加坡應當作為馬來亞聯邦之一的正當性。

綜言之，新加坡國家收藏的建立可以大致分成幾個階段：一、私營機構時期，主要仰賴共同持有人的捐贈與來自外界的募捐；二、公營時期，博物館與圖書館交由殖民政府管理，以政府的資金開始有規劃的購入書籍與藏品，但仍舊仰賴外界的捐贈；三、國家博物館時期，新加坡建國後重新審視既有的各項藏品，並重新分配館藏資源，國家博物館也轉向以人文歷史展示收藏為主，而將舊有的自然科學類展品轉出，購藏經費多來自於政府編列的預算，但依舊接受外界的捐贈。

結語

總結新加坡國家收藏建立的三個時期：私有、殖民、建國後，可以見到在不同的時間段中，收藏者分別具有不同的目的，進而影響對博物館收藏政策的制定。在私有階段的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可以將該館視作是上流階層們私人共有的「奇珍異寶展示櫃」，在這樣的脈絡下，博物館並未具有「公共」的概念，而當中的收藏也以收藏者個人的興趣偏好為主，物件或許並未具有實際上的藝術或是科學價值，更多的是能夠滿足收藏者的好奇與物慾。到了殖民時期，新加坡書院圖書館以及後來的新加坡書院圖書館暨博物館、萊佛士圖書館暨博物館、昭南博物館等，都是具有公共性質的公共機構，本身肩負教育大眾以及展示殖民地的功能，而兩者中又以展示殖民地為重，因此在展示策略上，也會開始轉向以科學的論述方式，來編撰、說明與研究這些展品，而收藏策略上也有別與過去奇珍異寶式的收藏，而是具有明確主題、類別的收藏。

在獨立建國後，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自 1957 年起，開始被賦予愈來愈多的社會責任，這樣的現象在 1965 年獨立建國後變得更加明顯。而來自政府的介入與安排，也比上一時期來得更加直接有力。此外，隨著新館舍的建立，國家博物館也從一個內容較廣的綜合性博物館，轉向專注於人文歷史的文化類博物館，而長久以來位於聚光燈之外的藝術展示，也一躍到了博物館的核心地位，成為國家博物館發展與展示的主要對象。從國家規劃的角度來看，新加坡政府開始將文化發展視為國家規劃的一環，以國家的力量來支持相關的文化教育推廣，越來越多的相關政府單位、委員會被設立，這當中最具影響力與代表性的，即是在 1988 年 2 月由時任第一副總理（First Deputy Prime Minister）兼國防部長（Minister of Defense）吳作棟（Goh Chok Tong, 1941-）所提議成立的「文化與藝術顧問委員

⁷⁶ 朱紀蓉，〈博物館發展中的國家力量：台灣、新加坡比較研究〉（科技部：2015），頁 6。

會」 (the 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⁷⁷ 該委員會在隔年所提出的報告書中，詳盡地規劃了新加坡未來數年於藝術文化領域中的建設與發展，並對於現存的藝術文化機構提出了建議。該份報告書的出現與之中的規劃，大大地影響了至今為止新加坡政府的國家文化政策，也告示著新加坡的文化發展進到了下一個階段。

⁷⁷ Singapore, 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Report of 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 (Singapore: 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1989)

參考資料

政府文件

1. Singapore, 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Report of 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Singapore: 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1989.
2.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National Museum Art Gallery official opening, 21 Aug. 76*,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76.
3. Singapore,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Report on the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for the Year ending 31st 1948*,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49.
4. Straits Settlements,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Annual Reports 1893*, Straits Settlements: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1893.
5. Singapore,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Report on the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for the Year ending 31st December 1954*,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55.
6. 中華民國：朱紀蓉，〈博物館發展中的國家力量：台灣、新加坡比較研究〉，中華民國：科技部，2015。

中文書籍

陳鴻瑜，《新加坡史增訂本》，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

西文書籍

1. Corner, Edred John Henry, *The Marquis: A Tale of Syonan-to*,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81.
2. MacGregor, Arthur, *Curiosity and Enlightenment: Collectors and Collection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Tan, Kevin Y.L., *Of Whales and Dinosaurs: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Singapore: NUS Press, 2015.
4. Taylor, Alan J. P.,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西文論文

Hanitsch, Richard,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vol. I, Walter Makepeace, Gilbert E. Brooke and Roland St. J. Braddell eds., London: Murray, 1921, pp. 519-566.

西文期刊

S. Osborne, Megan, "Early Collector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 *The Heritage Journal* 3(2008): 1-15.

網路資源

1. Lee Kong Chia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https://lkcnhm.nus.edu.sg>> (2019/1/23 瀏覽)
2. NUS Museum: <<https://museum.nus.edu.sg>> (2019/1/23 瀏覽)
3.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https://www.nationalmuseum.sg>> (2019/1/23 瀏覽)
4.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 (2019/1/23 瀏覽)